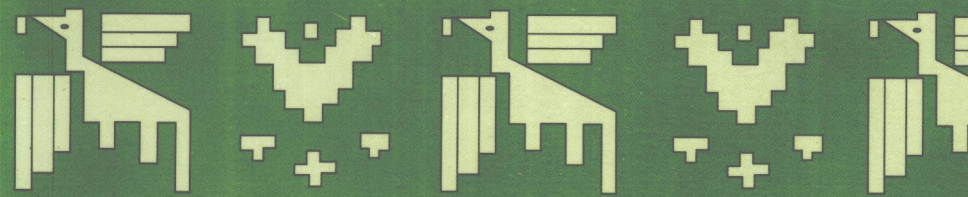


五指山风韵

——海南少数民族文学探析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指山风韵:海南少数民族文学探析/华子奇,陈立浩主编.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6
ISBN 7-5442-0232-1

I. 五... II. ①华...②陈... III. 少数民族文学—文学
研究—海南省 IV. I20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3110 号

WU ZHI SHAN FENG YUN

五指山风韵

——海南少数民族文学探析

-
- 主 编 华子奇 陈立浩
责任编辑 梁晓亮
封面设计 陈 兰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海南五指山市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75
字 数 360 千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3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0232-1
定 价 28.8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导 言

我国各民族的文学,一般都包括两大部分:即人民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和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许多民族地区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学,其中不少优秀的作品早已享誉海内外,为我国多民族的文学增添了光辉。如被誉为我国三大英雄史诗的《格萨尔王传》(藏族)、《江格尔》(蒙古族)和《玛纳斯》(柯尔克孜族),它们不仅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灿烂明珠,也是世界文学中的珍品。特别是宏篇巨著《格萨尔王传》,更冠古今中外。各兄弟民族的作家文学,在我们党和国家正确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的指引下,创作空前繁荣,开拓了崭新的局面,涌现出大批的作家和大量有影响的优秀作品。它们以独特而浓郁的民族特色,在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百花园中大放异彩,绚丽多姿,广为世人所关注。在我国民族文学的花丛中,海南民族文学可谓是盛开的一朵南国之花!

(一)

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海南黎族、苗族和回族人民,他们居住在美丽富饶的五指山区,总人口约 130 万,其中黎族约 120 万,苗族和回族约 10 万。这里有奇特的热带雨林风光,丰富的热带作物资源,以及独具魅力的旅游资源。百余万民族同胞,勤劳耕耘于这片沃土,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而他们的民族文学,便是其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了解和研究海南黎族、苗族和回族的民族文

学,有必要对他们的历史加以简述。

海南黎族历来以土著自居,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解放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海南岛先后发现大量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其出土器物有石器和陶器。在石器方面,以磨光、有肩、有段式的斧、锛比较普遍,大型石铲较多;^① 陶器则有夹砂粗陶、泥质细陶和印纹硬陶三种陶系。^② 这些出土器物,考察其性质,它们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包括雷州半岛)发现的原始文化极为近似。在学术界,多数人都认为黎族与我国南方操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壮、侗、水、布依等民族,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是从古代“百越”族发展而来的,特别是与“百越”中的“骆越”的关系更为密切。我国学者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掘,以及民族学、语言学等各方面的资料,初步推断海南黎族的远古祖先,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或更早的时候,从广西大陆沿海地区(包括雷州半岛)漂渡琼州海峡,陆续迁入海南岛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中期或更早年代,这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殷周之际,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现今百余万黎族人民,主要集居在五指山区。

考古专家于 1992~1993 年前后两次在三亚市落笔洞发掘出较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其中遗迹有用火的堆积和灰烬,遗物主要有石、骨、角、蚌、牙制品等。这些遗物通过¹⁴C 年代测定,落笔洞遗存距今约为一万年,是海南迄今为止所知时代最早的一处人类活动文化遗存。据专家研究分析,认为落笔洞发现的打制石器及骨、角器基本上承袭了华南旧石器时代的技术传统,其中石器器类的不少特点与华南洞穴遗存的旧石器相去不远,具有旧石器的遗风。但在落笔洞遗址的文化内涵中,同时又出现一些新的文化因素,“这种情况正反映出落笔洞遗址含有新、旧两种文化在演变和交替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的复杂现象,当处在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

① ②参见海南民族博物馆陈列的出土文物。

文化发展的中间环节上,故在其文化面貌上表现出固有的承上启下的文化过渡性质特点。”^①

落笔洞遗址的古人类,考古专家将其暂命名为“三亚人”。“三亚人”与黎族有没有族源关系呢?黎族学者邢关英撰文指出:“‘三亚人’与黎族人只能是一种血统关系,族属关系。”但他又同时强调“要确凿的证实这种族属关系,还需要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等的辛勤劳动”,“尚需等待地下考古资料来证实”。^②

海南苗族迁移来宝岛,始于明代万历年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海南岛的苗族是在明代从广西作为兵士被朝廷征调而来,尔后落籍海南,古代称为“苗黎”。《民国感恩县志》载:“又有一种苗黎,凡数百家,今加蕃盛散居,县境有之……盖前明时,剿平罗活、抱由二峒,建乐安营,调广西苗兵防守,号为药弓手,后营汛废,子孙散居山谷,仍以苗名……不耕平土,仅伐岭为园以种山稻。”清代道光《琼州府志》卷十二说:“儋州又有苗黎……盖前明时,剿平罗活峒黎叛,建乐安城,调广西苗兵防守,号为弩手,迁于此,即苗裔也。”海南苗族人民主要居住于琼南地区。^③

海南回族人民聚居三亚市羊栏区的回辉、回新两个村。他们的祖先大约在12至13世纪时,从印度支那半岛的占城(即今越南南部平定省一带),漂泊到海南岛的南部海岸,至今已有七百年左右的历史了。据明万历《琼州府志》卷三记载:“乃宋元之间,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村、番浦。其人多蒲、方二姓,不食豕肉,家不供祖先,共设佛堂,念经礼拜……”《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和《崖州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据当地回民传说,宋元间回族只有四五十人分驾两只船从越南占城来,初居万宁县的番村,后迁移到三亚

① 参见郝思德、黄万波:《三亚落笔洞遗址》,南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

② 参见邢关英:《“三亚人”与黎族人》,《海南档案》1998年第2期。

③ 参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概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镇附近定居。^① 至今还有少数回族人民散居于万宁、儋州等地。

海南黎族、苗族和回族人民,在其历史的长河中,以智慧、才华,创造了丰富的民族文学,它是我国民族文学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海南的民族文学,是宝岛的文化遗产和历史画卷,对它给予应有的重视,加以认真的研究,这既是整理海岛历史文化的任务,又是海南在新世纪促进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其意义是重大和深远的。

海南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建立之前,宝岛上的民族文学,主要是各兄弟民族人民创作的民间文学。近半个世纪来,海南的民族文学领域,逐渐涌现出了民族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后,作家文学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促使海南的民族作家文学初具规模。我们根据这种情况,试从民族民间文学和民族作家书面文学这两方面,对海南民族文学加以研究和评介。

(二)

黎族是最早开发和建设海南宝岛的民族,广大黎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口头创作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这是海南民族民间文学的主体部分。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少同志对黎族民间文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搜集、整理和出版。现已公开出版的有《黎族民间故事集》(花城出版社)、《黎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海南传说》(广东旅游出版社),以及《黎族情歌选》和《五指山风》(花城出版社)、《五指山传》(暨南大学出版社)等,保亭、白沙等民族自治县的文化部门,还陆续编印了黎族民间故事和歌谣,以及民间谚语和谜语等。可以说黎族民间文学品种齐全,

^① 参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概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形式多样,神话、传说和故事,歌谣、史诗和民间叙事长诗等,都有较为丰富的资料。

黎族神话内容广泛,诸如开天辟地、人类起源、万物兴起、祖先崇拜等,都有生动的描述。其中,以《大力神》、《黎母山传说》和《雷公根》等最富有代表性。黎族原始先民心目中的“大力神”,是一位开辟天地的巨人,他气概不凡,改天换地,力大无穷,给人以气吞山河之感。他完成开天辟地之后,又“脚划群山”,“凿通沟谷”,兴起“茂密森林”,汇成“奔腾江河”,让宇宙万物充满生机。《黎母山传说》讲述了黎族祖先的来源。传说黎族的女始祖黎母,出生在黎母山,由雷公轰破蛇卵而出,它反映了黎族古老的图腾崇拜和“万物有灵”的宇宙观。这则神话还通过黎母生息的进化轨迹,对原始初民从人类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经过缓慢的经验积累,然后才举步从蒙昧阶段的初期、中期和晚期,进入到野蛮阶段的发展历程,作了追忆的描述和形象的印证。《雷公根》是描述人与雷公较量本事的斗争故事,它形象地反映了人类由于有火的发明和运用,从此有了雷公不可抗衡的力量,显示了人的才智和本领。上述神话故事都具有不容低估的社会认识价值。

黎族的民间传说较之于远古时期的神话,显得更为瑰丽多彩,这类作品大致可分为:①人物传说。它是黎族人民根据其对生产斗争和社会变革的认识和理解,通过艺术的构思创作的各种关联着一定的农事活动和历史事件的传说故事。《台风的传说》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台风的传说》通过对台风形成的解释,描述台风的危害,以及黎族青年打菲、打维兄弟俩奋起搏斗台风精的壮举,颂扬了黎族人民征服自然的斗争精神。②民俗传说。它是与黎族民俗相关的故事。民俗传说好似一幅幅风俗画,对有关的民俗作了形象的描绘。如有关“三月三”的民俗传说,就从多种角度探寻了“三月三”的兴起和由来,铺叙了“三月三”传说的丰富内容,有的侧重记叙纪念祖先,有的着重描述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婚姻,有的述说先辈恩赐

的幸福,有的讲述求子心愿等。这说明“三月三”节日民俗是黎族古代多层次文化的积淀,反映了古代黎族人民的文化心理特征。③动植物传说。它是通过对有关动植物外形特点和习性特征的解释、描述,曲折地反映社会生活,其作品的主人公,多是拟人化的动植物。传说《狗与黄獠》,在解释和描述狗与黄獠外形特点及习性特征的同时,巧妙地编织了狗与黄獠交往的故事,以此对现实生活人际交往中损人利己的行为,作了曲折的反映和幽默的嘲讽,表达了黎族人民的爱憎感情和道德观念。④风物传说。它是叙说地方的名山大川和文化古迹的种种特点及其由来和命名,其内容直接关联着地方的风物。黎族人民有感于家乡的风物景色,创作了《五指山传说》、《七指岭的传说》、《鹿回头》和《吊罗山》等优美的风物传说故事,让美丽迷人的山川更增添无限的诗意和神秘的色彩。有关五指山的传说,不同的异文故事,虽然讲述的内容有别,但它们都揭示了相同的主题:五指山凝聚着黎族儿女的血汗,世世代代的黎族人民是开发、建设五指山的主人。《五指山的传说》中的阿立一家,惨死于坏人之手,血染五指山;《五指山传说》中的翠花姑娘,她为民除害,壮烈献身五指山。这类故事也许无史料记载,但它们千百年来却一直讲述在黎族人民的口边,代代相传,广泛流传于民间。这些传说内容,形象地展示出黎族人民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极为艰难的行程,以及他们是如何以顽强的生存意志和斗争精神,征服自然,降伏妖魔,为后人创建美好家园的。今日五指山的挺拔之势,巍峨之貌,不正是黎族人民美好心灵的展现吗?人们通过这些优美的风物传说,增进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认识 and 了解,加深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

黎族人民集体创作的散文形式的口头文学作品,除神话、传说以外,还有许多富有幻想色彩或现实性较强的民间故事。在幻想色彩浓烈的故事中,不少优秀作品集中地展示了黎族人民的社会理想和道德观念,反映了他们的恋爱、婚姻生活。深受读者喜爱的幻想

故事《椰子壳》，它将“椰子壳”拟人化，通过超自然的情节描述，形象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主题：一个人不管外形如何，只要勤劳动，会做工，就值得尊重，活着就有自身的价值。黎族人民十分看重劳动，他们的社会理想的基础就是劳动。他们把这种社会理想生动地体现在《椰子壳》里，以炽热的情感，从多方面描写“椰子壳”勤劳、朴实、正直的品德。他们对“椰子壳”的赞美，也就是对人民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理想的热情歌颂。黎族儿女对“椰子壳”的喜爱，从美学的角度看，正表现了他们视内在美重于外在美的美学观。“椰子壳”的内在美，既是黎族人民美好心灵的写照，又是他们“外朴中美”的传统审美意识的形象体现。脍炙人口的《勇敢的帕拖》、《星娘》等故事，生动地展示了黎族人民在深受权势欺压的古代社会中，他们仍不乏驰骋神奇的想象，追求美好的爱情生活的愿望。帕拖在即将完婚之际，听说残暴的老鹰精要破坏他的美满婚姻，立即奋起反抗。他在土地公公的相助下，一路英勇征战，直捣老鹰精老巢，最后战而胜之，救出了受害的妇女，同时也维护了自己的婚事。帕拖因营救了龙王的公主和国王的女儿，他在归途中受到二王的盛情款待，龙王要以公主相许，国王要招他为驸马，他却一一谢绝，回家和昔日的情伴结了婚。帕拖对爱情如此专一，其情操是值得人们永远称赞的。《星娘》中的弟弟，以虔诚之心请求天上的“星娘”作妻，谁知不幸之事却接踵而至，作恶的皇帝活活地拆散了这对情投意合的夫妻，将美丽的“星娘”劫入皇宫。弟弟在仙女的帮助下，苦练一手绝好的射箭技艺，射中金凤鸟，取出夜明珠，然后身带明珠赶到京城，从皇宫迎回了心爱的“星娘”。这类爱情故事，具有鲜明的爱憎感情，曲折离奇的情节。它们往往是在爱情与现实生活产生尖锐的矛盾时，而人们又是那样执着地追求向往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美好生活，于是便借助幻想来表现人们的理想，让其挚爱的情人，或受仙人的指点，或得宝物的相助，从而战胜妖魔，击败作恶的皇帝，最终获得幸福的爱情。这种幻想而来的胜利，实质上是人们对坚贞爱情的赞

美,对爱情焕发出的强大力量的形象描绘。黎族的爱情故事,一个突出的主题,就是讴歌爱情的真诚和坚贞,坚信唯有这样的爱情才能克服重重困难,战胜一切邪恶,实现美好的心愿。

《槟榔的故事》、《尔蔚》和《甘工鸟》等爱情故事,其幻想的因素有所减弱,现实性大为增强,它们也都同样极为鲜明地表现了上述主题。《槟榔的故事》中的青年猎手椰果,历尽艰辛,治服猛虎,除掉巨蟒,从五指山峰的绝壁摘取了红橙橙的槟榔,将这份珍贵的礼物献给心爱的佰廖(黎语,意即美丽)姑娘,获得了甜蜜的爱情。黎族少女尔蔚,宁肯刺喉自尽,也不屈服嫂嫂的高压,殉情之后与情郎龙仔同葬于石棺材。黎家姑娘甘嫫,一心爱着相好的青年猎手,极力反抗父母哥嫂的逼婚,最后将身化鸟,自由地飞向广阔的蓝天。这些故事已不是在单纯地幻想世界,描述社会,而是紧密地联系金钱婚姻的现实生活,讲述由于父母的包办,兄嫂的不仁,权势和金钱的残害,酿成的一出出爱情悲剧。故事的作者,以愤懑之情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以敬仰之意颂扬黎族儿女的反抗斗争精神,及其对爱情的真诚、坚贞。

在黎族民间故事中,那些现实性较强的作品,一般都是内容单一,情节简单,篇幅也较短小。它们多是表现广大劳动人民与权贵者的斗争生活,从正面赞扬黎族儿女勤劳朴实,机智勇敢的高尚品德,揭露和鞭挞黎头、峒主和财主的愚蠢暴戾、损人利己、贪得无厌的反动本质。《长工捞龙》中的地主,既残酷狠毒,又愚蠢可笑。聪明的长工捞龙,运用智谋,借打蚊虫之机,先将地主戏弄一番,进而又施妙计,置地主于死地,一举为乡亲父老报仇雪恨,让大伙扬眉吐气,高兴不已。《聪明的亚坚》、《劳祝献“宝”》两则,故事的主人公孤儿亚坚,青年劳祝,他们面对横行霸道的黎头、财主,毫无畏惧,敢于斗争。他们往往抓住黎头、财主无知的弱点,针对他们财迷心窍、贪得无厌的本性,设好圈套,放下钓饵,引诱他们上钩钻套,取得一个个智斗的胜利。最后,叫黎头、财主丑态百出,一个个都罪有应得,

落得令人嗤笑的可耻下场,真是大长了劳动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作恶权贵的威风。同时,黎族儿女也以民间故事进行自我教育,如《砍刀的故事》、《老树和乌鸦》、《水族舞会》等,它们讲述娓娓动听的故事,或用具体的事实,或用生动形象的比喻,讲明某一生活哲理和训诫意义,启迪人们的智慧和思考,劝导人们以传统的美德和道德标准,来规范自身的言行。从这个意义讲,民间故事又是黎族儿女生产、生活中的良师益友。

黎乡素有歌海之称,丰富的歌谣是黎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渔猎生活的时代,黎族已有体现原始劳动号子意味的短歌,以及吟唱鸟兽虫鱼习性特征的《禽兽谣》。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黎族人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引吭高歌,创作了内容极为丰富的民歌,诸如生活歌、劳动歌、儿歌、革命歌谣等。特别是歌咏人们爱情生活的情歌,反映黎族传统民俗的习俗歌,更是多姿多彩。黎歌形式多样,甚富特色。以歌的曲调而论,内容不同、地方不同,调子也各自有别。砍山伐木有《呼嘿调》、摇篮催眠有《呵咧调》、斗牛有《呼啦调》等。保亭有《啰呢调》、琼中有《啰咧调》、通什有《叽呃调》、白沙有《哇呀哇调》、乐东有《千家调》等。以歌谣句式而论,三亚、乐东、东方和昌江等地的黎歌以五言句为多,保亭、通什、琼中等地的黎歌,句式变化灵活,五、七言和九、十言兼而有之,长短不一。如《大路歌》,以长短错落的歌词,吟唱一对自由相爱的情人,他们虽然遭到父母的指责,但始终未被威迫屈服,双双出走以示反抗。《难忘的伴侣》,用变化灵活的句式,哀哀泣泣地唱着爱情的悲歌。一首《相亲》歌,句式的长短随着歌者感情的抒发而变化,自然、亲切,将黎族“相亲”的婚俗娓娓唱来。黎歌的特色,由此可见一斑。

黎族除篇幅短小的民歌外,还拥有长篇的创世史诗,以及多种题材的民间叙事长诗。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指山传》,是问世的第一部黎族创世史诗。全书共分八章,内容很丰富,史诗对洪荒年代的神话传说,远古时期的民俗风情,及其迷幻的诗境和美好的

情怀;对黎族先民与自然和邪恶斗争的历史及其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它是研究黎族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等很有价值的资料。黎族民间叙事长诗,以爱情题材居多。这类作品有叙述相思、相恋和相怨的,有吟唱迫婚、抗婚和逃婚的。如《婚歌》,它通过男方父亲的歌唱,将一位健康、美丽、能干的“儿媳妇”,形象地展示在人们面前。歌者激动的心情、喜悦的神情、定亲的称心、祝愿的美好,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愉悦,那样的喜气洋洋,使人们从中深切地感受到一对正热恋的青年,他们的相爱是多么的称心如意,多么的幸福啊!叙事诗《巴定》以曲折的情节,凄切的低吟,描述了“父母迫巴定,嫁给无情郎”的悲剧,读来叫人潸然泪下。这些叙事长诗,从爱情、婚姻的角度,反映了黎族古代社会广阔的生活画面,展示其特有的风情、婚俗,塑造了一个个为追求婚姻自由、自主而敢于抗争、坚贞不屈的黎族青年形象。不少歌颂人民勤劳勇敢、追求自由、反抗压迫,充满乐观自信的黎族民间叙事长诗堪称黎族民间文学宝库中闪光的珠玉。

海南民族文学中的作家创作文学,从总体来看,黎族的文学创作较为繁荣。黎族作家创作文学的兴起,是黎族文学新发展的重要标志。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涌现出了以龙敏、王海为代表的一批黎族作家,形成了文学创作的新局面。他们步入文坛的时间相对较短,然而,创作的作品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受到读者的好评,其中的优秀作品还荣获全国和省一级的奖励。这批黎族作家,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民族责任感。他们站在时代的高度透视民族的历史,观察黎族的现实,描绘了独特的人物形象、劳动场景、生活画面、风土民俗,以及黎族儿女在新时期的历史进程中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流向。纵观年轻的黎族作家创作文学,表现出这样两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作家着眼于黎族人民在新时期的新生活,从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中捕捉时代的信息,撷取生活的浪花,反映新时期黎族的新人新事、新风尚。龙敏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小说《老蟹公》便是一

例。作品主人公阿栓生活劳动的黎村,虽有五指山的秀丽风光,但在动乱的“文革”期间,大自然的光泽也黯然失色,不用说这里的人们是怎样备受折磨的了。所以,那时阿栓的形象被扭曲了,成了被人称为“老蟹公”的畸形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富民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阿栓的家乡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黎寨呈现一派兴旺景象。在这样的新形势下,阿栓这位“老蟹公”便脱壳了,他以全新的形象展现在人们眼前,黎族勤劳、朴实的传统美德,又重新在他身上熠熠闪光了。

广大民族地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与守旧,愚昧与科学的矛盾异常突出。在这种矛盾冲突中,黎族的作家高度地关注着本民族的历史命运,受到现实的强烈触动。他们抓住那些体现新与旧相互斗争的人和事,作为创作的题材,进行艺术的构思,加以形象的描绘,为新人、新事呐喊助威,为守旧者改弦易辙指明方向。王海的小说《弯弯月光路》,谱写了一曲倡导科学,唤醒愚昧的赞歌。黎族青年阿边,在那种跑山狩猎、刀耕火种的生活模式里,练就了浑身的力气和勇敢的精神,他自以为有了这样的本领,便可成为男子汉的楷模,姑娘们也自会相中自己的。然而,我国的社会毕竟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农村劲吹着现代文明的春风,古老的黎寨办起了学习科学文化的夜校,科学种田正在变成农民的具体行动。作品中另一黎族青年阿波,紧紧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掌握了修理拖拉机的技能,学会了科学种田,他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据特殊的地位,对人们特别有吸引力。难怪昔日和阿边对歌的水妹,最终投入了阿波的怀抱。阿波和水妹自由结合,标志着黎族儿女价值观念的改变,现代文明在黎乡掀起了新的浪潮。在这新的浪潮中,阿边也终于觉醒,他与阿波一道“相互搀扶着,踏着皎洁的月光”,走向新的生活。小说《桥》中的王亚磊县长,从跌跤的沉痛教训中,明白了应当怎样做一位称职的人民公仆;《帕格与那鲁》中的几位黎族青年,

在种种矛盾中对人生的道路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些都使人感到黎族儿女在新的历史时期,迈出了新的步伐。

描绘新的人物,歌颂新的生活,这是黎族作家创作文学的一个特点。除上述作品外,龙敏的《年头夜雨》、符玉珍的《年饭》等,都是这类题材的好作品。

其次,作家以新的思想观念去考察社会,思考问题,揭示矛盾,反映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民族的生活内容、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心理素质、审美情趣等,都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从黎族作家创作文学看,创作者的可贵之处,就是他们的主体认识也发生着同步变化。作家们生动地描述黎族人民通过对历史的审视,特别是对本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自觉地以现代意识和现代文明加以参照;对数千年的优秀民族文化既继承和发扬,又不断地注入新的血液,新的内容,使其更进一步地自我完善。龙敏的小说《同名》,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品中的主人公亚因,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作家刻画亚因的形象时,一方面展示她勤劳、贤惠和善良,对这种传统美德加以充分的展示和讴歌。另一方面,又将人物置于种种矛盾冲突之中,让亚因以其言行对某些旧的观念加以否定。黎族民间流传着《后母煮谷种》的故事,讲述后母如何用煮过的谷种去陷害前娘的儿女。“十个后母九个恶”的世俗偏见,仍有其市场。亚因作为一位后母,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一件件具体的事情,证实她是一位心地善良,极富母爱,对前娘的子女体贴入微的好后母,让人们改变了“十个后母九个恶”的旧观念。亚因改嫁之后,前夫的母亲孤单一人,亚因日夜思念,很想把老人接过来赡养,但这却是黎族旧时的“族规”所不允许的。可是,亚因认为赡养老人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婆婆不能随改嫁媳妇一道生活的老规矩是应该改变的,她以现代文明社会的新风尚开导丈夫,终于冲破旧观念的束缚,将老人接了过来。王海的小说《吞桃峒首》,通过对峒首一系列的言行和心理活动的描写,以及峒首由一

次次的心态失衡到认识的一次次提高,表达了作者对民族传统观念重新审视的严谨态度,让人们从中懂得哪些好的传统观念应该保留和遵循,哪些陈旧陋习应该改革和摈弃。我们看到黎族作家十分热爱自己的民族,熟悉自己的民族,理解自己的民族,他们新的历史时期,把握住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走向,对民族心态加以深层的开掘和适度的描写,既展示了黎族作家创作文学的特色,又显示出作家较好地驾驭本民族创作题材的功力。

(三)

苗族文化古老,历史悠久,数百万苗族人民分布于贵州、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海南和广西等省(区)。海南苗族同胞,从内地迁徙海岛,定居的历史不过四百多年。如今,海岛上六、七万苗族儿女,多杂居琼南一带。他们植根于苗族生活的沃土,创作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学。本书将对海南苗族的民间文学和文人书面文学进行探析,谈些浅见。

海南苗族民间文学品种齐全,形式多样,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和民间叙事长诗等,都有较为丰富的资料。就神话而论,内容广泛,诸如开天辟地、人类起源、万物兴起、祖先崇拜,都有生动描述。其中,以《盘皇歌》、《水淹歌》和《神农公》为代表作品。《盘皇歌》追忆了盘皇开天辟地的壮举,颂扬了苗族祖先繁衍苗家儿女的伟大功绩。《水淹歌》是一首吟唱洪水神话的古歌,它同我国南方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大体相似,其基本内容都讲到当人类遭到洪水浩劫后,人间再重新繁衍人类。在远古社会,人间为何暴发洪水呢?《水淹歌》开篇唱道:“问你何年雷落地?何人捉禁在仓中?去底(指洪荒岁月之时)闰年雷落地,张公捉禁在仓中。”传说张公有七兄弟,武艺高强。因为张公将雷公“捉禁在仓中”,所以“雷公上天作风雨,风雨连流水淹地”。这里讲到洪水泛滥与雷公的关联。贵州苗族的

《洪水滔天》等创世古歌,吟唱洪水的起因,是说雷公和姜央(传说苗族的创世祖)闹矛盾,雷公想淹死姜央一家人,泛起漫天洪水。看来,海南苗族的《水淹歌》,与贵州苗族的洪水神话,两者对洪水的起因解释是基本一致的。漫天洪水之后,大地一片荒凉,人间断了烟火,人类必须再繁衍。对此,《水淹歌》作了这样的描述:“洪水淹天几朝退?葫芦抛落在何方?洪水淹天七朝退,葫芦抛落昆仑山。”“水淹到天何人死?恩留何人在人间?水淹到天百姓死,恩留伏羲小妹人。”这里吟唱了再创造人类的事。贵州苗族古歌是说:“水淹绝人烟,鸟死山凄凄,人绝地冷落……葫芦兄妹俩,相两和相芒,造人接后代。”两相比较大同小异,具体的叙述虽然有别,兄妹的名称又不同,但是,洪水后只剩葫芦兄妹,然后再造人类的事却是一致的。海南苗族民间文学,与内地苗族民间文学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散文体的《神农公》,是一则物种起源神话。苗族是个古老的稻作民族,早在4000年前的“三苗”时期,就已种植水稻。《神农公》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苗族农耕历史的古老。谷物生产是人类的生活之本,幸福之源,它与人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探寻谷种的来源,自然是人类祖先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谷种到底从何来?这在苗族的谷种来源神话中有着多种传说,仅贵州苗族地区就流传这样三种说法:洪水滔天后,世上无谷种,是白鸽和麻雀飞到银河系边衔回谷粒;远古之时,原始人住在山洞里发现了谷神;谷种原来在神农氏那里,是狗去取回谷种的。海南苗族的《神农公》,是说神农公找到谷种的。这与汉族神话记载的“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保”(《淮南子·修务训》)相似。上述种种解释,有的反映了原始先民的图腾意识,有的则体现原始人崇拜祖先的观念。它们的解释虽然各不相同,但却共同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谷种是客观存在的。这说明苗族先民对谷种起源的认识和理解,具有一种可贵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这是《神农公》的认识价值之一。《神农公》另一方面的认识

价值,是它展示了苗族先民在远古社会的生活和生产遗迹,以及人们的顽强生存意志和探索精神。当初,人类的生活物质,完全来自自然之物,他们“采树叶,剥树皮,挖草根”,以此为食,艰难度日。这种采集生产,是人类在低级蒙昧时代社会生活的主要特点。从低级蒙昧时代到农耕初始的中级野蛮社会,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这时,生产力极不发达,“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陌生的、对立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种情况下,“原始人是曾因为生存的艰难和对自然斗争的艰难而备受折磨的。”(郭圣铭编著:《世界古代史简编》)原始人值得称赞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在“备受折磨”之中不甘屈服的生存意志和探索精神。《神农公》反映的内容,即“神农公”寻找谷物的举动,便是形象的描述,生动的印证。“神农公”寻找谷种,“踏遍千山万水,尝尽百草野果。”这足见其寻谷种之不易。“神农公”如若没有坚韧的毅力,顽强的斗志,是难于翻越群山峻岭,涉足滔滔江河,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的。同样,他是凭着进取、探索的精神,勇于尝百草,嚼野果,甘为人类寻找谷种而献身的。他找到了野谷粒,精心繁育,勤劳耕耘,终于教会人们种植谷物,开创了有粮食吃的幸福生活。我们从“神农公”身上清楚看到:苗族先民从人类发展阶梯的底层起步,总是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毫无畏惧,不断探索,缓慢积累认识大自然的经验知识,遵循自然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规律迈步前进的。原始人的这种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改造大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仍是有启迪的。

在海南苗族地区,流传着不少的民间传说故事。它们有的颂扬苗族的英雄儿女,有的讲述苗族的生活习俗,有的讴歌苗族人民的反抗精神。如优美的幻想故事《割割国王头》,它叙述一位苗族放牛仔,有幸和仙女结成连理,从此两人“生活得甜甜蜜蜜,美美满满”的。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国王抢走了仙女,放牛仔气愤得吐血而死,离开了人世。死后的放牛仔,变成了一只特同鸟。它“天天在皇